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ISSN 1008-245X,CN 61-1329/C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中国边疆民族地区产业升级的新结构经济学分析：以新疆纺织服装产业为例
作者：王勇，钱婧，郭少瑛
收稿日期：2024-03-01
网络首发日期：2025-01-03
引用格式：王勇，钱婧，郭少瑛. 中国边疆民族地区产业升级的新结构经济学分析：以新疆纺织服装产业为例[J/OL].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https://link.cnki.net/urlid/61.1329.C.20250103.1326.004>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中国边疆民族地区产业升级的新结构经济学分析： 以新疆纺织服装产业为例^①

王 勇¹，钱 婧²，郭少璜¹

1.北京大学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北京 100871

2.江苏大学 财经学院，江苏 镇江 212000

[摘 要] 面临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亟需探索边疆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以新疆纺织服装产业为例，使用新结构经济学方法进行潜在比较优势甄别，发现从新疆的自然禀赋结构、要素禀赋结构和制度禀赋结构来看，其纺织服装产业在原材料、区位交通、生产要素成本、国家政策、特殊制度等方面具有潜在比较优势。通过分析新疆纺织服装产业的上游、中游、下游产业链，梳理发展现状，提出利用制度优势承接产业转移、通过市场开拓应对外部风险等转型升级路径。在此基础上，对边疆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状况及自然、要素、制度禀赋方面的共性特征进行梳理，提出应结合边疆民族地区特殊属性与发达地区产业转进趋势、基于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阶段与差异化特征、考虑边疆民族地区面临的地缘政治形势与制度禀赋优势对边疆民族地区产业进行分析，充分发挥因势利导作用，因地制宜推动产业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新结构经济学；产业升级；边疆民族地区；禀赋结构；劳动密集型产业；纺织服装产业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中国边疆民族地区自然资源丰富、战略地位突出、经济总体欠发达，面对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经济发展与长治久安关乎国家的民族团结、政治外交、国防安全和生态安全。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加强边疆地区建设，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也明确提到，“要进一步加大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支持力度，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和创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本文所研究的边疆民族地区，特指那些少数民族人口数量较多、民族地区占比显著、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色的边疆省份，具体包括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

[收稿日期] 2024-03-01。 **[修回日期]** 2024-11-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AJL01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2141301）。

[作者简介] 王勇（1978—），男，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云南省、辽宁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①，其总面积约占中国国土面积 50%以上，区域内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比重高达 51.09%^②。2023 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上述六大边疆民族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在全国排名均相对靠后，并且除内蒙古自治区外，其他地区人均 GDP 全部低于 7 万元，与国内发达地区差距明显。

当前，中国正同时经历结构转型、产业升级、制度转轨、经济全球化、大国崛起五个重大结构性变革，边疆民族地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首先，在西部大开发、对口援建、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等一系列重要政策和制度支持下，边疆民族地区已逐渐成为中国中东部省份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这一方面有助于发达地区实现“腾笼换鸟”，另一方面推动了边疆民族地区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升级，从而促进中国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其次，边疆民族地区位于中国对外开放前沿，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印度等 13 个中亚、东南亚及东欧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接壤。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边疆民族地区的区位优势进一步凸显，随着贸易、服务和资本流动的增加，将逐渐成为国内和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枢纽，在打破西方封锁和促进经济交流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最后，由于边疆民族地区多宗教、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的特性，对其进行集中管理存在一定的难度，这为境外宗教势力和极端组织提供了可趁之机，增加了当地公共安全事件的风险。因此，边疆民族地区在地缘政治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本文将重点探讨边疆民族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升级问题，旨在探索推动这些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基于三点原因。第一，劳动密集型产业门槛相对较低，与边疆民族地区当前的发展阶段和比较优势相契合。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普遍滞后，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存在明显的不平衡问题。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对资本和技术的要求相对较低，使得其在当前阶段成为适合边疆民族地区优先发展的产业。第二，劳动密集型产业拉动就业能力较强。在边疆民族地区，由于语言文化隔阂，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居民仍以传统农业和畜牧业为生，整体收入偏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助于吸纳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升少数民族居民的收入水平，推动共同富裕。长远来看，这有助于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第三，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为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提供配套和支撑。一方面，工业化生产需要劳动力具备一定的技能水平、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以及团队合作精神，因此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过程中，当地政府与相关企业将着重对少数民族工人职业技术和语言能力进行培训，这有助于提升当地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使其更好地适应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需求；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带动相关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形成，具体涵盖原材料供应、生产制造、物流运输等环节，为后续其他类型产业的发展 and 升级奠定坚实基础。

一、文献回顾

与本文主题密切相关的文献可以分为三支。

第一支文献从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两大视角出发，重点研究边疆民族地区相关问题。其中，社会治理方面的研究基于边疆民族地区自然条件、区位特征、民族宗教等方面的特殊性，

^① 之所以在九大边疆省份中排除了黑龙江省、吉林省和甘肃省，是因为其少数民族人口占比偏低，分别为 3.52%、8.68%和 10.63%（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出）。

^② 由笔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出。

聚焦边疆民族地区潜在在内外风险以及公共安全问题的应对和处理。如李俊清^[1]分析了边疆民族地区公共危机事件的类型、特点和发展趋势,认为应根据边疆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针对民族分裂、暴力恐怖等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构建科学有效的应急体系。张明波^[2]基于边疆民族地区在国家治理大局中的重要地位,提出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同时面临国内外形势复杂、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对外开放风险增加等挑战,据此提出边疆民族地区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路径。与社会治理有所区别,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关研究多以当地贫困问题为抓手。基本思路是通过横向对比明确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并通过总结一般规律,提出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有效路径。如陈全功等^[3]认为,作为中国贫困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少数民族地区需要高度重视空间贫困问题,积极转变扶贫思路。刘东等^[4]提出后脱贫时代边疆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理路,并从战略主体、战略思维、战略支撑、战略衔接、战略目标五大方面对边疆民族地区相对贫困的治理方式进行分析。

第二支文献重点研究新疆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此部分文献多从宏观视角出发,以探讨政策机制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为主,重点聚焦中国对口援疆行动。从政策效果看,大部分学者肯定了援疆行动对新疆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正向促进作用。如高志刚等^[5]发现,在对口支援和扶贫开发期间,新疆区域内经济差异不断缩小。刘金山等^[6]证实了对口援疆政策能够显著推动新疆 GDP 增长,但其作用效果因地区发展阶段而异。徐明^[7]进一步研究表明,针对新疆地区开展的省际合作帮扶能够产生投资效应、集聚效应和学习效应,且与中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支援方的帮扶效果更优。区别于过去以干部援疆为主的单边支援,近年来更提倡通过产业援疆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8]。2004年后,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出现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9],为新疆创造了承接发达地区产业的机会。但有研究表明,对口援疆机制下的产业转移依然存在引进企业对税收贡献不高、对相关行业带动作用不大、对当地劳动力吸收作用不强等不足^[10]。

第三支文献重点研究纺织服装产业的转型升级问题。国内学术界对纺织服装产业的研究成果目前依然集中在 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形式上以案例研究居多。黄先海^[11]指出,纺织服装产业既是传统产业,又是现代化产业,技术改造是纺织业实现产业升级的关键。顾强^[12]认为,在纺织工业转移过程中,原料产区、中西部地区对市场定位、技术水平以及产品发展方向等方面应当给予充分重视。王珺等^[13]以南海西樵纺织专业镇的技术创新过程为例,考察了技术创新如何从技术服务组织向企业内部转化的过程,建议将基于集群的中小企业由模仿走向创新的过程分解为从模仿到新产品的“购买”再到“自制”行为。熊兴等^[14]探讨了中国经济新形势下纺织服装产业转型升级面临的问题,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巩固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形成以文化为引领的发展新模式。刘众^[15]以纺织服装产业为例,发现工业互联网的软件集成云架构、大数据分析能力、全覆盖智能感知功能、要素互联互通优势,可促进纺织服装产业补齐信息化短板、走向定制化模式、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开展融通创新。

通过梳理可以发现已有文献存在两点局限。一是对边疆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缺乏特殊地区案例以及中观产业层面的分析。从内容来看,现存文献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社会治理层面,以政治形势、战略方针、民族认同等方面的论述为主。即便是与当地经济发展相关的研究,也多从宏观视角出发,聚焦边疆民族地区的“共性”,而忽略了各地禀赋结构上的“个性”。此外,上述文献有关产业升级问题的研究大多止步于对地区产业结构特征的

探讨，对于那些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产业，则缺乏深入、聚焦的分析。二是已有关于纺织服装产业转型升级问题的文献中，尚未从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阶段和对应的禀赋条件进行特别系统的学理分析，并且基本依然秉承“以产业发达地区作为参照系，看发达地区有什么和做什么，然后自己缺什么补什么”的主流思路提出路径或对策，容易使得政策建议违反本地的比较优势。

针对上述局限性，本文利用新结构经济学思想及研究方法，对边疆民族地区产业升级问题进行探讨。首先，在新结构经济学五大类产业划分^[16]中，边疆民族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多属于追赶型，其技术水平并非中国领先（也非世界领先），因此需要通过模仿吸收发达国家以及国内其他发达地区的先进技术获得进步，其发展的关键在于新结构经济学所提倡的禀赋驱动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其次，新结构经济学以禀赋结构作为逻辑分析起点，将其划分为要素禀赋结构、制度禀赋结构以及自然禀赋结构，并认为给定上述三类禀赋结构，加上可获得的技术条件，可以决定某种产品或者服务的生产成本^[16]。通过对禀赋结构进行梳理，可以初步判断边疆民族地区发展该产业（或某个产业的该环节）是否具有潜在比较优势，同时有助于明确地方政府所制定的产业规划和政策是否与其比较优势相一致，是否能够切实有效地推动边疆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最后，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有为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发挥的作用，王勇等^[17]认为“有为政府”应该在各个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结构制宜地培育、监督、保护、补充市场，纠正市场失灵，促进公平，增进全社会各阶层长期福利水平。当下边疆民族地区的软硬基础设施仍然较为落后，在拥有对口支援等丰富政策支持背景下，地方政府如何“有为”以帮助当地制造业更好地抓住发展机遇，也是本文希望在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下进一步探讨的重要问题。目前已有部分文献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针对具体产业和地区开展案例研究。如朱兰等^[18]以宁波如何融入长三角一体化为例，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贡献了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于佳等^[19]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分阶段、分产业链环节对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和总结。王勇等^[20]对新能源汽车产业不同发展阶段的瓶颈约束和产业政策得失进行分析，验证了“有为政府”动态性和革命性的内涵，并从中总结得出“换道超车型”产业的共性规律。本文是将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应用到产业升级实践中的一次尝试，可以为国内其他地区，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针对边疆民族地区产业升级问题，本文提出如下分析框架：第一步，梳理边疆民族地区禀赋结构，从而甄别地区发展该产业是否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第二步，从行业特征、发展规模、技术特性等方面出发，系统分析该产业上、中、下游各生产环节发展现状，并通过区域内部以及与行业领先地区的横向对比，进一步明确其产业定位和竞争优势；第三步，考虑边疆民族地区语言文化隔阂、人口密度较低、环境保护要求、基础设施薄弱、地缘政治状况复杂等特征性约束，识别产业升级面临的主要瓶颈约束；第四步，结合边疆民族地区的制度禀赋以及“一带一路”、中欧班列带来的区位优势，提出产业升级的具体实现路径。

二、新疆纺织服装产业的案例分析

新疆是中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拥有“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区位优势。作为中国面积最大、民族构成最全的省级行政区，新疆险要的地理位置、优越的区位条件、

丰富的能源资源以及多元的民族宗教文化决定了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对外交流等方面的重要战略地位。2022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时指出，“随着我国扩大对外开放、西部大开发、共建‘一带一路’等深入推进，新疆从相对封闭的内陆变成对外开放的前沿”。这一转变不仅加速了新疆的经济发展，也使其成为中国乃至整个欧亚大陆的重要经济和贸易枢纽。此外，新疆利用对口援疆、生产建设兵团等制度优势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并在此过程中推动产业链创新和升级的路径以及基于自身比较优势，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开拓国外市场的有为实践，也能够一定程度上为其他边疆民族地区提供参考。

本文之所以重点研究纺织服装产业，主要有三点原因。第一，纺织服装产业属于新疆的传统优势产业和支柱性产业，棉花和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则是新疆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打造的“八大产业集群”之一^①，并且与其他多个目标产业集群一样，都显著依赖当地的自然禀赋结构，因此对该产业前景、挑战与对策进行研究，对于新疆整体的产业升级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二，中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纺织服装生产、消费和出口国，同时也是纺织产业链最完整、门类最齐全的国家，但在中国纺织服装业目前最发达的江浙等地，该产业的许多劳动密集型环节逐渐失去比较优势，新疆等劳动力要素相对便宜的中、西部内陆地区能否抓住机遇承接东部转移出的这些生产环节，对于东、西部地区来说都是当下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与此同时，新疆纺织服装产业发展对其他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转进型”产业同样具有借鉴意义。第三，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疆作为“一带一路”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作为接壤八国的边疆民族地区，具有重要的国际地缘政治意义，而其棉花产业与纺织服装产业近年来尤其受到来自美西方的恶意打压，如何更好地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在优势以及对口援建等制度优势，以有效应对国外的制裁，显然也是中国当前和未来产业升级面临的“常态化”挑战。

（一）新疆禀赋结构与潜在比较优势

从自然禀赋来看，新疆土壤条件适宜，年日照时间较长，有利于长绒棉、彩色棉、陆地棉等棉种生长，因而能够为纺织服装产业发展提供充裕、优质的原材料。此外，新疆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等八个发展中国家相邻，市场广阔，区位优势明显，目前已经成为联通中国、中亚、欧洲以及中东地区的重要枢纽。随着中欧班列运行常态化，新疆纺织服装产品得以直接销往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国家，转运时间和运输成本大大降低。

从要素禀赋来看，新疆劳动力、土地、能源、厂房等要素价格相对低廉，有利于纺织品生产和贸易。劳动力价格方面，由于人均GDP水平较低（2022年为6.86万元/人，同时期全国平均水平为8.57万元/人）^②，其在用工成本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能源价格方面，以2023年1月为例，新疆代理购电价格为266.17元/MWh，全国排名倒数第二，和全国用电总价格排名第一的湖南相比相差343.64元/MWh^③。此外，新疆土地价格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十届七次全会提出要重点建设的八大产业集群是：油气生产加工产业集群、煤炭煤电煤化工产业集群、绿色矿业产业集群、粮油产业集群、棉花和纺织服装产业集群、绿色有机果蔬产业集群、优质畜产品产业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②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③ 数据根据各省份电网代理购电价格表整理。

导致当地厂房价格偏低。2023 年，全国工业仓储用地成交地面均价 352 元/平方米，而新疆为 76 元/平方米，仅为全国的 1/5^①。

从制度禀赋来看，正式制度方面，新疆是中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在立法、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方面享有高度自治权，拥有喀什、霍尔果斯两大经济特区，并设有自由贸易试验区。自 2014 年新疆实施发展纺织服装产业规划以来，中央和地方层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以推动新疆纺织服装企业的发展。2020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明确提出要“支持纺织服装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2022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自治区棉花及纺织服装产业政策措施的通知》，对棉花、纱线的补贴力度和补贴种类进行调整，并加大了对纺织服装类企业吸纳新疆籍员工就业的补贴力度。此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一特殊的制度禀赋也在新疆纺织服装产业中发挥了引领创新的作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多次提到兵团在新疆纺织业的创新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如推动行业建设自动化、连续化、柔性化生产系统等。非正式制度方面，新疆目前生活着 56 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新疆常住人口的 57.76%，其中维吾尔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44.96%，占少数民族人口的 77.85%^②。少数民族传统服饰富有特色，以维吾尔族为例，男子有“袷袂”，女子有艾德莱斯绸衣裙，民族服饰中的诸多元素可以成为现代服装设计的灵感来源。更直接地，随着新疆文旅产业的发展，这些民族服饰将吸引更多游客前往租用或购买。此外，由于地理位置和交通因素，新疆出口额有一半以上来自边境贸易，2023 年对除阿富汗以外的邻国的出口额占比为 78.3%^③，而新疆的蒙古族、俄罗斯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与邻国拥有相似的宗教信仰、文化传统与语言，为民族服饰出口提供了极大优势。

综上，从新疆的自然禀赋结构、要素禀赋结构和制度禀赋结构来看，其纺织服装产业在原材料、区位交通、生产要素成本、国家政策、特殊制度等方面具有潜在比较优势。

（二）新疆纺织服装产业发展

1. 产业链上游

纺织服装上游原材料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以棉、麻、蚕丝为代表的天然纤维，二是以合成纤维、再生纤维等为代表的化学纤维。新疆纺织原材料的供给以棉花为主，化纤产业规模并不大。棉花种植面积、总产量和产出质量等方面，新疆连续 28 年稳居全国第一，在纺织服装产业链上游同样占据重要位置。2022 年，新疆棉花产量达到 539.1 万吨，占全国棉花总产量的比重超过 90%；种植面积 2 4969 平方千米，占全国棉花种植面积的比重上升至 83.2%^④。基于此，本文将重点对天然纤维进行分析。

2019—2023 年，新疆棉花种植面积一直稳定在 2 5000 平方千米左右^⑤，棉花产量则呈波动上升趋势。新疆棉花的生产情况和地区分布主要呈现三大特征。第一，生产建设兵团作用突出。由于历史原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积累了丰富的棉花种植经验，并在各地拥有良好的产业根基。特殊体制机制下，兵团凭借其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现已成为对新疆棉花产业

^① 数据来源于国信房地产信息网，其中新疆工业仓储用地成交地面均价利用各地成交面积加权计算得到。

^② 数据来源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③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乌鲁木齐海关。

^④ 数据来源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

^⑤ 数据来源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19—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关于 2023 年棉花产量的公告。

贡献度最大的生产单位。2022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棉花种植面积达1 275.9万亩^①，占新疆棉花种植总面积的51.1%；产量215.4万吨，占新疆棉花总产量的40%，生产份额占全国比重达到36%^②。第二，棉区分布广，多数地区棉花种植规模较大。新疆半数以上地区的棉花种植面积超过100万亩，其中塔城、伊犁、喀什等五个地州的棉花种植面积已经突破300万亩。除生产建设兵团外，阿克苏地区棉花产业规模最大，种植面积和产量分别达到812.32万亩和102.71万吨，大幅领先于其他地区。第三，相比北疆地区，南疆地区棉花产业的整体规模更大，分布也更为集中。除生产建设兵团外，新疆规模最大的三个棉区，即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全部位于南疆地区，且地理位置彼此相邻，其棉花种植面积共计1 766.07万亩，占新疆棉花种植总面积的59.6%；棉花产量共计229.05万吨，占新疆棉花总产量的42.5%。

2. 产业链中游

纺织服装产业链中游主要包含纺纱、织布、印染、服装制造四个环节，其产品大致可以分为纱、布、服装三大类。作为中国最大的纺织服装原材料供应地，目前新疆在纱、布等初级产品生产方面已初步形成规模优势。从产量来看，2022年新疆纱产量达到188.93万吨，是当地纺织业在全国占比最高的产品（6.95%）；布产量共计8.47亿米，占全国1.81%。但是，与其他纺织服装发达省份相比，新疆初级产品生产规模并不具备比较优势。数据显示，新疆布产量不足江苏的1/4（48.7亿米），只有浙江的1/8（67.7亿米）^③。从变化趋势来看，2013—2022年新疆纱产量稳步上升，并在2016年突破100万吨大关；布产量虽于2013—2015年有轻微波动，但2016年之后同样呈现逐年上涨的态势（见图1）。相较之下，在印染和服装制造环节，新疆纺织业的表现并不突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新疆印染布产量为3 317.00万米，不到布产量的5%，生产份额在全国仅占0.05%，而新疆服装成品年产量为6 015.11万件，与纺织大省江苏（22.57亿件）存在巨大差距^④。以上数据说明，新疆纺织服装产业链虽已初步完善，但产业链内部各生产环节发展并不均衡。纺纱、织布等更靠近产业链上游的生产环节规模优势明显，而与产业链下游关联更紧密的印染和制衣环节则存在很大的升级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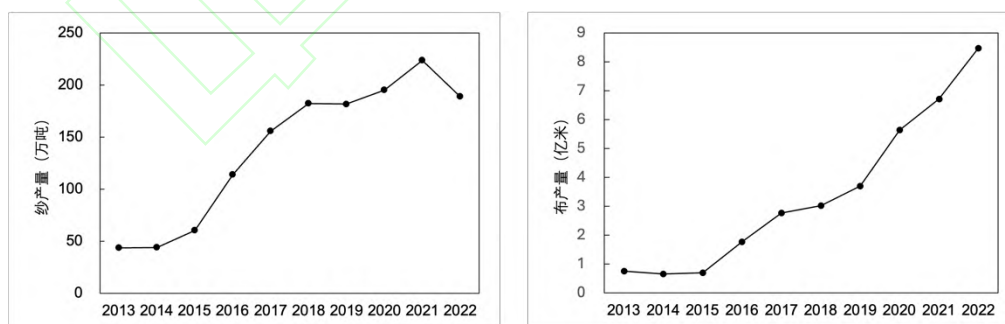


图1 2013—2022年新疆纱、布产量变化趋势

^① 1亩=666.67平方米。

^② 数据来源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

^③ 数据来源于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江苏省、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④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2021年全区纺织工业生产运行情况；江苏省统计局：2021年1—12月江苏省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注：数据来源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13—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上述规模特征与变化趋势的背后可能存在三方面原因。第一，政策因素驱动。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新疆纺织服装产业发展促进就业的指导意见》发布，制定了纺织服装产业的十年发展规划，同年国务院明确提出，要将新疆建成为国家重要棉纺产业基地、丝绸之路经济核心区服装服饰生产基地与出口集散中心，极大推动了新疆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而印染环节在环保政策约束下，发展规模受到限制。以和田地区为例，其位于塔里木河流水系上游，生态环境脆弱，纺织行业印染环节在当地建厂将会给整个河流体系带来污染，另外污水废气的处理技术和设备成本也十分高昂，相关企业难以形成规模集聚。第二，经济发展水平与技术条件限制。印染、制衣与纺织服装产业链下游对外贸易、电子商务等高附加值环节密切相关，对人力资本和技术的要求更高。新疆经济发展阶段相对落后，科技创新能力以及中高端人才较为缺乏，因此上述生产环节数字化转型推进相对缓慢，其生产规模和效率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大幅提升。第三，产业链一体化程度不足。新疆棉产量全国占比超过 90%，但纱、布、服装等生产规模却并不具备比较优势，这与新疆纺织服装产业生产结构与模式有关，在本质上可以归因于延伸产业链协调度和完整性的不足。具体而言，受限于人力资本、技术条件等因素，新疆纺织服装产业发展仍然以“资源驱动”为主，纯棉纱产量全国占比高达 36%^①，而纱产量仅占 6.95%。作为原材料的主要组成部分，化学纤维生产能力一定程度上能够直接影响当地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新疆在化学纤维产业链上游具有明显的规模优势，石油预测资源量约占全国陆上石油资源量的 30%，2023 年原油产量共计 3 270.09 万吨（占全国 15.64%）^②，但其与下游纺织服装产业一体化程度不强，因此无法有效助力纺织服装产业规模扩张。

为了进一步明确新疆不同地区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差距，本文通过“天眼查”分别统计了新疆各地纺织业以及纺织服装、服饰业存续、在业企业的数量，然后运用 ArcGIS 软件对以上数据进行分析，最终形成纺织服装产业链中游企业分布图。其中，纺织业按照加工方式和产品类别两大维度进行划分，涉及纺纱、织布、印染三个生产环节，具体包含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等 8 个子类别。“天眼查”数据显示，从企业总数来看，新疆纺织业企业南北分布相对均衡，而纺织服装、服饰业企业在分布上明显更向南集中。具体而言，虽然纺织类企业和纺织服装、服饰类企业超过 1 000 家的南疆地区与北疆地区在数量上基本持平，但是地区间企业总数的差值却完全不在一个层级。南北疆地区纺织业企业之间的数量差距稳定在 1 500 个左右，而纺织服装、服饰业企业之间的数量差距最高却达到 4 000 以上，并且企业数量最多的三个地区全部位于南疆地区。从与上游产业的关联度来看，新疆纺织服装企业数量较多的地区与棉花种植规模较大的地区基本重合。出现例外的是和田地区和乌鲁木齐市，其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都不高，但地理位置与新疆主要棉产区相邻，因此纺织产业同样发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纺织服装产业的生产和加工环节通常分布在原材料较为丰裕的地区附近，产业链上游和中游存在较强的关联性。

3. 产业链下游

^① 数据来源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

^② 数据来源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2023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纺织服装产业链下游以销售环节为主,具体包含线下百货、电子商务等渠道。统计显示,2014—2020年新疆纺织服装企业数量由560家增加到3328家,增幅高达494.3%,其中吸引内地投资企业1034家^①。在中央、地方扶持政策以及对口援疆国家行动的支持下,目前新疆已经成为承接东中部地区纺织服装产业转移投资额最大、企业数量最多的西部省份。2020—2022年,国务院陆续批准在乌鲁木齐市、喀什地区、阿拉山口市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为新疆进一步发展口岸经济,推动纺织服装产品国际贸易,以及更好地融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提供助力。

新疆纺织品中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出口,中亚地区则是其主要出口目的地,出口额约占新疆纺织服装总出口额的80%^②。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国内环境规制日趋收紧的背景下,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步丧失,越南、孟加拉国、柬埔寨等国快速崛起,开始大批量承接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纺织服装加工业务,纺织订单因此出现外流。近年,受新冠病毒感染疫情以及国际市场环境的影响,新疆纺织产品出口交货值持续下降。2017—2019年新疆纺织产品出口交货值始终维持在12亿元以上,2020年纺织产品出口交货值下跌至10.81亿元,同比下降39.7%,2021年纺织工业仅实现出口交货值8.23亿元,比2020年下降27%。其中,纺织业实现出口交货值3.71亿元,下降45.8%;纺织服装、服饰业实现出口交货值4.52亿元,增长3.4%^③。

(三) 新疆纺织服装产业升级约束

新疆纺织服装产业原材料丰裕,土地、电力、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相对低廉,受国家政策扶持力度较大,因而具有潜在比较优势。但是,其目前面临地缘政治问题带来的负面市场需求冲击以及基础设施较为薄弱、自然环境保护政策限制、人力资本水平偏低等方面的瓶颈约束,从而难以将上述潜在比较优势转化为实在的比较优势、竞争优势,阻碍了纺织服装产业的转型升级。本文基于新疆的发展阶段,从禀赋结构和纺织服装产业链的发展现状出发,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

1. 市场需求约束

(1) 市场需求制约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对新疆棉纺织产业的恶意打压。新疆最突出的自然禀赋优势在于棉花大规模生产和稳定供给能力,西方国家对其棉纺织产业的恶意打压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上述潜在比较优势的发挥。

“新疆棉事件”发生后,为规避潜在风险,欧美大型纺织服装企业开始在生产线上对新疆棉及其制品进行替换,并将中间产品大量转交给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生产。面对欧美订单大幅减少带来的损失,新疆纺织服装生产、加工和出口企业一般会采取两种应对方式。第一种方式是被迫调整目标市场,重新规划生产份额,将原定用于出口的产品投向国内或者中亚、西亚地区。但是,这种方式意味着企业需要在市场开拓、供应链建立等方面付出额外成本,在总预算不变的情况下,其用于研发创新、品牌打造的投入自然减少,产品附加值难以持续提升。此外,由于面向欧美出口的产品一般质量更高,若大量投向国内市场,可能会

^① “新疆纺织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2022)”即将召开[EB/OL].(2022-08-09)[2024-02-01].<http://info.texnet.com.cn/detail-905641.html>.

^② 数据来源于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③ 数据来源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2018—2022年发布的全区纺织工业生产运行情况。

对产业链下游的其他纺织服装企业造成冲击。第二种方式是加大棉花进口，在原有产业链上进行原材料替换。但是，新疆作为中国最大的棉花产地，当地绝大多数纺织企业都是以新疆棉作为原料，棉花加工企业和纺织服装生产企业之间也早已形成相对稳定可靠的供应链。大批量替换原材料不仅成本巨大，难以保证品质，无法再有效利用新疆作为棉花产地的规模优势和价格优势，还有可能加剧整条产业链的不稳定性。

此外，从全国范围来看，由于价格低廉、供给稳定、品质较高，国内发达地区的很多纺织服装企业都将新疆棉作为主要生产原料，并将其制品大量出口至欧美国家。与新疆本地不同，发达地区大型纺织服装企业数量更多，若制裁长期持续，这些企业又不愿放弃庞大的欧美市场，那么中下游需求减少带来的负面效应最终会通过产业链向上传递，从而导致新疆棉花价格波动，甚至出现冗余，最终阻碍其纺织服装产业潜在比较优势的发挥。

(2) 市场需求制约同时来自于国内外同类型纺织服装企业带来的竞争压力。由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日趋复杂，新疆纺织服装产业面临的同行间竞争压力持续增大，产业链上中下游同时出现需求收缩、市场份额下降的情况。国内外需求的有限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疆纺织服装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从国际市场环境来看，除去西方国家制裁这一战略因素外，新型纺织强国崛起也是国外需求减少的重要原因。由于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国内的环保政策更严格，中国对国外纺织服装企业的投资吸引力逐步下降。与此同时，伴随越南、柬埔寨等国纺织服装产业的迅速发展，新疆在产业链中游生产和加工环节的可替代性增强，因此纱、布等初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所占份额遭到分割。

从国内市场环境来看，新疆纺织服装产业面临的需求困境与经济形势和市场开拓能力有关。由于地广人稀，新疆本地对纺织服装产品的需求量有限，因此无论是中间产品还是制成品，都将国内目标市场定位于中部和东部地区。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市场空间广阔，内需潜力巨大。然而近几年，国内民众消费信心不足，服装零售产业低迷，新疆初级产品及制成品的生产和加工也因此受到冲击。就国内而言，新疆首先面临来自江苏、浙江、山东等发达地区的竞争。然而和上游棉花产业相比，新疆在纺织服装产业链中下游的竞争优势不够明显。这与其产品质量挂钩，但也和新疆纺织服装企业市场开拓能力整体偏弱有关。一方面，新疆远离国内纺织服装消费的终端，需要承担的转运成本更高；另一方面，新疆企业管理运营模式落后。受限于语言和文化差异，加之培养模式不完善等原因，新疆电商直播、网络销售平台建设等环节难以有效推进，使其错失了开拓市场、扩大需求的良好时机。

2. 基础设施约束

新疆纺织服装产业原材料优势突出，在国家和地方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产业链中上游企业发展迅速，并初步形成规模优势。在这一阶段，新疆纺织服装产业若要进一步朝专业化、集群化方向升级，面临的主要瓶颈约束在于各类基础设施不完善。

第一，交通和物流基础设施。随着西部大开发和对口援疆行动持续推进，新疆逐渐成为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重要目的地之一，这为纺织品贸易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有助于加速推进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建设。同时存在的现实约束是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新疆位于西北内陆，与产品主销市场距离较远，交通运输条件不便导致纺织服装产品运输时间和成本更高。即使国家和地方已经对纺织品出疆给予大量的运输补贴，但是从长期来看，并不能从根本上提高新疆纺织服装企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新疆近几年面临美国等西方国家制裁，棉纺织产业

需求的不确定性增强。然而，物流体系的不完善使纺织服装企业无法及时追踪下游需求量变化，从而加剧了中上游产品大量冗余的风险，企业去库存压力随之增大。

第二，产业配套设施。现阶段，在新疆打造纺织服装生产集群的过程中，为充分整合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企业拥有的资源优势，产业链各环节专业化分工的需求不断增强。但是，由于新疆棉花资源丰富，不论是本地企业还是来疆投资企业，都更倾向于对棉纺织等偏向产业链上游的生产环节进行投资，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纺织服装产业链面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并进一步导致具有比较优势的上游原材料、中游初级产品制造环节与更偏向下游的印染、销售环节缺乏有效衔接。产业配套设施的不完善使相关企业难以在同一体系内完成产品生产全流程，在有些情况下，疆内企业甚至不得不将初级产品运往内地进行深加工，运输等其他成本增加，产业集聚优势难以发挥。

3. 人力资本约束

现阶段，在产业链中上游，新疆致力于打造专业化的棉花与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劳动力需求量大，对工人劳动技能的熟练度和专业性要求较高，在附加值提升的关键性生产环节还需要创新型人才参与。然而，新疆人员季节流动性强，劳动有效供给不稳定。此外，由于少数民族人口众多，存在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对本地劳动力进行集中培训的难度较大。因此总体来看，在印染、制衣等中下游生产环节，新疆专业技术工人和管理人才十分缺乏。人力资本结构与实际需求的不匹配使新疆本地企业和外来投资企业需要在相当长的周期内，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对新疆本地员工进行培训，或者开具更高工资，从外地直接引进专业人才，而无论以上哪一种方式，最终都增加了纺织服装企业的生产成本和投资成本，削弱了其转型升级的动力。

在一定程度上，人力资本方面的约束是由新疆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禀赋结构特征客观决定的。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少数民族众多、宗教文化多样，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全国范围相对落后，因而对人才的吸引力天然较弱。针对人才稀缺问题，过去数年间，新疆政府先后提出并实施了少数民族科技骨干特殊培养计划、“天山英才”培养计划、“天池英才”引进计划等人才工程项目，并设立新疆人才专项发展基金。但是，上述政策对纺织服装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十分有限，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产业内中高端人才紧缺的现状。一方面是由于新疆教育基础薄弱，资源严重缺乏，教育水平地区差距较大，因此短期内难以通过高投入弥补；另一方面，新疆高等教育在科目设置方面并没有很好地与其比较优势相匹配，职业教育体系也并不完善。具体而言，截至 2024 年底，本科教育方面，全国开设纺织工程专业的院校共 48 个，新疆只有 4 个；全国开设服装设计与工程、非织造材料与工程专业的院校分别为 92、17 个，新疆都只有 1 个；全国开设服装设计与工艺教育、丝绸设计与工程专业的院校分别为 4 和 1 个，而新疆无院校开设此类课程。职业教育方面，新疆只有 8 个学校设置了专门的纺织相关学院，即位于乌鲁木齐的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喀什职业技术学院、塔里木职业技术学院、图木舒克职业技术学院、新疆石河子职业技术学院、伊犁职业技术学院以及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四）新疆纺织服装产业升级路径

1. 利用制度优势承接产业转移

(1) 对口援疆行动由来已久，且成效显著。1979年7月，中央转批乌兰夫在全国边防工作会议上所做的报告，提出“要组织内地省、市，实行对口支援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并在同月确定由江苏承担对口支援新疆的任务。1996年，随着《中共中央关于新疆稳定工作的会议纪要》的发布，以“干部援疆”为主要特征的对口援疆工作拉开序幕。此后，中央多次召开相关会议，持续加大对口援疆力度，增加援助资金和人才干部投入，形式也由单省援疆向多省共同援疆转变。2010年3月，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确定由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深圳等19个省市承担对口支援新疆的任务（见表1），新一轮援疆工作正式展开。在对口援疆行动的支持下，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发达的江苏、浙江等地开始将逐渐丧失比较优势的中上游生产环节向新疆转移。基于各地比较优势，发达地区通过园区建设、基础设施完善、人才技术流动、企业整体搬迁等途径，补足并延伸新疆纺织服装产业链，帮助其打造专业化集群，提升各环节生产效率和产品附加值，从而推动新疆纺织服装产业转型升级。

表1 19省市对口援建地区情况

支援方	受援方
北京市	和田地区；农十四师
天津市	和田地区
安徽省	和田地区
深圳市	喀什地区
山东省	喀什地区
广东省	喀什地区；农三师
上海市	喀什地区
浙江省	阿克苏地区；农一师
江苏省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农四师
江西省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福建省	昌吉回族自治州
山西省	昌吉回族自治州；农六师
河南省	哈密地区；农十三师
吉林省	阿勒泰地区
黑龙江	阿勒泰地区；农十师
辽宁省	塔城地区
河北省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农二师
湖南省	吐鲁番地区
湖北省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关于纺织服装产业对口援建情况，目前仍以碎片化的新闻报道为主，缺乏官方统计数据支撑。因此，为了更加直观地了解19省市对新疆纺织服装产业的支援现状，本文在北大法

宝数据库中以“纺织”和“援疆”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并在此基础上对 19 省市及其援建地区发布的相关法律文件进行筛选整理^①。从形式上看，对口援建虽然由官方组织牵头，但援疆企业仍然具备一定的自由度。具体而言，政府虽然会定期组织团队前往援建地区考察，或者通过项目推介会、产业对接会、经贸合作平台等方式发布产业、资源等方面的合作意向信息，但最终还是由企业根据实际需要，自主选择合作对象。从内容上看，对新疆纺织服装产业的援建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是技术和人才援疆。支援地选派纺织服装产业专业技术人员前往受援地，积极开展技术交流和帮扶工作，组织人才创新创业培训，提高新疆经信系统人员的现代企业管理水平。与此同时，鼓励受援地纺织服装企业职工前往支援地工业园区管理水平较高的地区进行培训和学习，交流当地纺织服装园区建设、管理等方面的先进经验。二是产业援疆。支援地利用自身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并购重组、项目投资等方式，在完成地区间产业转移和对接的同时，帮助新疆将纺织服装产业的潜在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目前，产业援疆已经成为发达地区以及部分中央企业最主要的援建方式。

通过分析发现，纺织服装产业支援地和受援地的比较优势基本契合。新疆纺织服装产业上游棉花主产地和中游纺织产品生产地存在大量重合，都集中分布在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乌鲁木齐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塔城地区、和田地区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因此可以初步判定，这七大区域纺织服装产业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在疆内较为明显。在此基础上，通过对 19 个援疆省市 2022 年纺织服装产业产值进行统计排序，将结果与对口援建名单进行比照，可以发现在上述七大区域当中，除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不在援疆名单内的乌鲁木齐市，全部接受来自国内纺织服装发达省市的对口帮扶。基于新疆的比较优势，并利用发达地区纺织服装产业所具有的技术优势、人才优势和规模优势，有助于新疆更好地开展产业承接工作。

(2)新疆需要以有效的方式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在各省市长对口援建的支持下，新疆目前已经在石河子、阿克苏、和田等多地建立起纺织服装工业园区。然而，产业转移并不等同于产业搬迁，如若无法实现产业本土化，并进一步推动相关生产环节技术升级，那么从长远来看，依然无法有效推动新疆纺织服装产业转型升级。因此，为了更好地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新疆政府在利用对口援建制度优势的同时，还应发挥因势利导作用。

第一，加强对本地劳动力的技能培训。由对口支援引进的高级技术人员毕竟只占少数，新疆纺织服装产业依然以本地工人为生产主体。基于当地劳动力资源充足、价格低廉，可生产效率低下、基本素质难以适应现代化生产要求的特点，若要更好地承接发达地区的纺织服装产业转移，首先，新疆政府应当加大对纺织服装劳动就业的宣传力度，积极提升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厂工作意愿，对吸纳新疆籍以及少数民族员工就业、主动加强劳动力技能培训和语言培训的纺织服装类企业分批分层给予补贴和奖励。其次，政府应当支持相关企业和产业园区建设宿舍、餐厅、幼儿园、医院等公共配套设施，尽量免除员工异地就业的后顾之忧，为后续长期的职业技能培训赢得时间和空间。最后，政府还应利用援建地的资源优势，一方面鼓励企业前往江浙等地学习日常经营、平台建设、园区管理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和模式，另一方面根据新疆纺织服装产业的比较优势和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建立专业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直接向相关企业输送纺织服装熟练工人和技术人才，从而最大程度减少其后期培训成本。

^① 北大法宝数据库的法律法规检索系统收录了 1949 年至今的法律法规，包括中央法规、地方法规、司法解释、立法资料、立法计划、法律动态、合同范本和法律文书等。

第二，加强兵团与地方的协同合作。与国内其他地区不同，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党政军企一体化，生产经验丰富、组织动员能力强，广泛分布于新疆各地，在延伸棉花产业链、推动行业创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各地区在承接纺织服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可以利用这一特殊的制度禀赋优势，积极推动兵地融合，加强与兵团企业、园区、科研机构等主体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最大限度发挥生产建设兵团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协调创新能力，使本地企业积极参与基础设施援建工程，融入发达地区纺织服装企业专业化分工体系，推进纺织服装全产业链建设，使所承接的产业环节更好更快地实现本土化，并在此基础上迭代创新，最终实现纺织服装产业转型升级。

中国东部发达地区以及大型中央企业在对口援疆过程中，也需要进一步明确对口援建的着力点，根据受援地区的经济基础和产业发展现状，助力新疆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与此同时，支援方还应及时调整援助方式，在资金帮扶、人才帮扶的基础上，注重提升当地企业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链打造等各环节的参与度，尽量避免全流程包办，从而更好地助力新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2. 通过市场开拓应对外部风险

(1) 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开拓中西亚市场。西方国家制裁和国内外竞争压力对新疆纺织服装中下游造成冲击，不仅增加了企业的销售成本，还使其面临供应链不稳定等因素带来的潜在风险，进而制约了产业的转型升级。为有效应对国外制裁，最大限度降低欧美订单减少带来的损失，新疆有必要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和产品定位，重新选择贸易对象，对国内外市场进行开拓。然而，中国纺织服装终端市场目前已趋于饱和，面对江苏、浙江等地的竞争压力，新疆既不具备区位优势，也不存在品牌优势，进一步增加国内市场份额的难度明显较大，且空间十分有限（见图2）。在此情形下，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将中西亚地区作为开拓市场的优先选择或许更为合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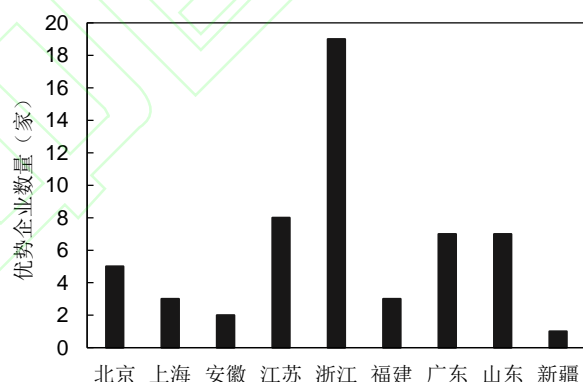


图2 多地纺织服装品牌建设情况对比结果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2021 中国纺织服装品牌竞争力优势企业名单》。

第一，新疆纺织服装产业开拓中西亚市场具备诸多有利条件。首先，中亚和西亚地区对中国纺织品需求量大，因此新疆纺织服装产品面临广阔的市场空间。近年来，东盟已逐渐成为中国纺织服装产品的重要出口地。2022年，中国向东盟出口纺织品服装共计582亿美元，对行业新增出口的贡献率高达90.3%^①。其次，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新疆区位和政策优势

^① 数据来源于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2022 年中国纺织行业经济运行报告》。

更为明显。新疆地处丝绸之路核心地带，位于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和中巴经济走廊交界区域，能够联通中国、中亚、欧洲和中东地区，是“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重要枢纽。目前，国家致力于推动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一带一路”便是推进国际大循环的重要平台。随着中欧班列运行常态化，经贸合作区、通商口岸建设持续推进，新疆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家的贸易往来进一步加强，这无疑为纺织服装产品开拓中亚市场创造了优越的条件。最后，新疆与中亚地区语言相近，风俗习惯相似，宗教文化、审美共通。在国内，与江苏、浙江等发达地区相比，新疆纺织服装产品在设计、营销等方面并不具有优势，整体竞争力不强。但是，面向中亚地区，新疆不仅能够利用其在原材料、价格等方面的比较优势，还能发挥其作为多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化优势，有助于打造特色纺织服装品牌、延伸纺织服装产业链。

第二，“一带一路”对推动新疆整体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有利于区域整体基础设施的改善。“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得到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出于对外交流和贸易的需要，在政策大力扶持之下，新疆各地交通运输、产业园区、境外合作园区等基础设施建设全面跟进，加快了边疆地区与核心区域之间的资源优势互补，有效带动了新疆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其次，有利于打破国际偏见，强化比较优势。“一带一路”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借助中亚国家的力量，能够一定程度改善国际社会对新疆的刻板印象。此外，“一带一路”倡议为新疆能源、纺织服装等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新契机，通过对外投资，其产品、服务得以更好、更快地“走出去”，产业国际影响力和整体竞争力在此过程中不断提升。最后，有利于促进边境贸易，推动周边国家经济发展，从而为新疆营造更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事实上，除新疆外，云南等地区同样位于中国边境地带，并常常面临来自周边国家的一系列不稳定因素。“一带一路”倡议倡导双向合作，不仅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同时也是哈萨克斯坦、缅甸、柬埔寨等中亚国家和东南亚国家产品“引进来”的过程。因此，“一带一路”贸易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民生福祉，进而维护边境和平，降低新疆等地区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外部风险。

在拓展中亚和西亚市场的过程中，除了完善各类软硬基础设施，降低与中亚国家的交易成本之外，新疆政府还应将纺织服装品牌建设作为重点，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机遇，推动产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升级。本土特色纺织服装品牌的形成既依靠市场自发力量，也离不开国家和地方的政策支持。从品牌初创期、成长期再到成熟期，新疆政府需要找准政策发力点，把握国家率先推动在化妆品、服装、家纺、电子产品等消费品领域培育一批高端品牌的重大机遇，提高对纺织服装品牌的政策支持力度。在自主培育一批具有民族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之后，凭借新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地位，通过加强口岸、园区、试验区建设，增加中欧班列和直达航班次数，深入与中亚国家和俄罗斯开展交流与合作，推动纺织服装产品出口，进一步扩大品牌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2) 基于比较优势打通国内市场。由于远离销售终端，新疆培育自主品牌并使其具备与江苏、浙江等地相竞争的能力具有极大难度。因此，面向国内市场，新疆纺织服装产业应当基于自身比较优势，将产业链中上游作为产业升级的重点。

中国人口基数大，纺织服装产品仍然存在一定的市场空间。新疆纺织服装产业部分出口产品被迫转内销有助于利用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在优势，进一步推动新疆纺织服装产业参与国内大循环，不但能够降低新疆纺织服装产品出口量减少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由于中国对欧美发达国家出口的纺织服装产品一般质量更高，若能利用好出口商品回流带来的市场竞争效应，亦能在一定程度上倒逼新疆纺织服装企业主动进行技术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

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政府还应发挥有为作用，通过完善软硬基础设施，缓解企业转型升级面临的成本约束。一方面，加强交通运输网络和现代物流体系建设，畅通供应链，在适度范围内提高对纺织服装产品的运输补贴，从而降低企业购买材料设备、销售产品的运输成本；另一方面，有必要运用数字技术，推动打造纺织服装“柔性供应链”，提高上游原材料供应商和中游生产厂家对下游服装销售品牌需求的快速反应能力，从而更加有效地应对西方发达国家制裁，尽可能降低企业原材料、制成品冗余造成的损失。

三、边疆民族地区的一般性分析

对中国其他边疆民族地区而言，新疆纺织服装产业案例同样具备借鉴价值。一方面，中国诸多边疆民族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工业化程度、禀赋结构特征等方面存在相似性，因此针对其经济发展目标、产业比较优势、政府因势利导角色等方面的分析也就具有了共通之处；另一方面，边疆民族地区各有其特殊属性，基于各地禀赋结构，并结合具体产业的技术特征对产业进行分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政策“大而化之”的问题，同时有助于降低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可能面临的风险与制约。

本文将首先对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禀赋、要素禀赋、制度禀赋方面的共性特征进行总结，然后分别结合自然禀赋与要素禀赋的共性、各边疆民族地区间的个性以及边疆民族地区特有的制度禀赋，强调分析边疆民族地区产业升级问题时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一）边疆民族地区的共性特征

1. 以经济发展促进边疆稳定

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仅事关现代化事业建设大局，更与整个国家的稳定密切相关^[21]。只有经济发展起来，从而创造大量工作岗位、给当地人民带来良好收入，边疆少数民族特别是跨境民族群众才能安居乐业、增强国家认同感，共同维护边疆的稳定与繁荣。本文选取地区生产总值、人均 GDP、工业增加值占比作为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程度的主要指标，在明确变化趋势的基础上，将其与国内平均水平进行比较，发现边疆民族地区目前在经济发展上存在两方面共性特征。

第一，经济发展滞后，区域发展不平衡。2013—2022 年，边疆民族地区 GDP 和人均 GDP 虽呈稳步上升趋势^①，但依然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同省（自治区）内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在经济运行规模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方面普遍存在较大差距。除西藏外，2022 年边疆民族地区 GDP 最高差值均在 3 500 亿元以上（西藏区域内 GDP 差值低主要归因于其较小的经济体量）。西藏、云南、广西、辽宁绝大多数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内蒙古和新疆虽然 40% 以上城市（地、州）的人均 GDP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其内部差值最高可以达到 20 万元，存在严重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经验表明，边疆民族地区内部及其与国内其他地区的发展

^① 相关趋势图留存备案。

差距若长期无法缩小或者消除，宗教矛盾、族际冲突等事件的发生风险将会增加，从而影响整体发展环境的安全稳固^[22]。这一现象固然与边疆民族地区的历史积累有关，但更主要的是由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人力资本等多重因素所致。如昭通、怒江等地位于云南偏远山区，由于地形条件复杂、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广泛，基础设施建设难度大，教育普及程度低，相关政策难以快速推行，最终导致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中部昆明、曲靖、玉溪等省内发达地区存在极大差距。

第二，产业基础薄弱，工业化发展不充分。工业化对于拉动地区增长、促进劳动就业作用显著，同时也是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绝大多数边疆民族地区目前依然处于工业化中期，第一产业占比偏高，结构上虽然以第三产业为主导，但与全国 52.8% 的平均水平相比仍有差距。本文以工业增加值占比评估地区工业化程度，发现 2018—2022 年西藏、云南、广西三地工业化水平明显低于全国平均，内蒙古和辽宁工业基础良好。但自 2013 年起，随着《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 年）》《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2013—2022 年）》等政策规划陆续颁布落实，两地工业增加值占比呈现明显下降趋势，直至 2018 年以后才逐步开始回升。新疆近年工业化发展迅速，2022 年工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全国平均水平^①。一方面，边疆民族地区禀赋资源具有其独特性。大部分边疆民族地区具备发展农林牧渔产业的历史传统以及优越的自然条件，例如内蒙古草地面积共计 5 437.42 万公顷^②，适合开展畜牧活动，广西和新疆独特的气候条件则有助于大规模发展种植业，因此当地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自然较高。另一方面，各地经济基础具有差异性。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其技术创新能力、科教文化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营商环境优化等方面挂钩，从而进一步影响产业发展的速度与质量，甚至产业对少数民族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边疆民族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显著，但受限于经济发展规模，重工业能效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相对缓慢，第三产业仍然依靠餐饮、住宿、旅游等传统服务业带动，因此产品附加值低，难以形成品牌效应，对当地经济可持续增长与民生就业的作用十分有限（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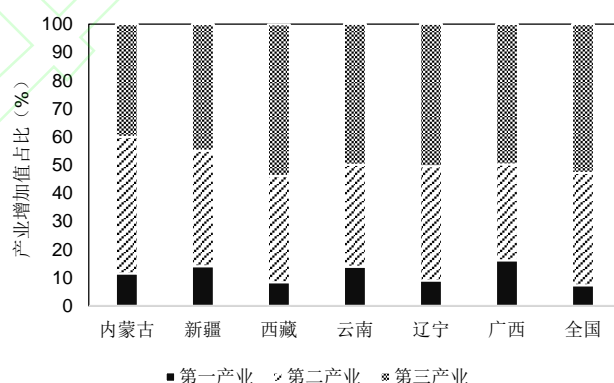


图3 2022年中国边疆民族地区产业结构

注：数据来源于2023年《中国统计年鉴》。

① 2013—2022年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工业化水平趋势留存备案。

② 数据来源于内蒙古自治区第三次国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

2. 自然禀赋结构

气候、土壤条件、能源、矿产资源、地理位置等共同构成了一个地区的自然禀赋结构，其不仅会影响当地的农业、畜牧业、采矿业，也在制造业的发展上发挥重要作用。首先，特殊的自然条件使得边疆民族地区分别有着相应的农业、畜牧业特产，比如新疆的棉花、云南的咖啡豆、内蒙古羊毛等，可以作为制造业的上游原材料。其次，矿产资源也是制造业重要的原材料来源。金属矿产方面，辽宁盛产铁矿石，内蒙古盛产铅、锌矿，西藏盛产铜矿，广西盛产锰、铝土矿；非金属矿产方面，云南盛产磷矿，辽宁盛产硼矿，内蒙古盛产萤石、品质石墨；内蒙古盛产品质石墨。再者，优良的光热条件与丰富的能源矿产资源为边疆民族地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低廉的电力成本。最后，在地理位置上，边疆民族地区一方面与中国主要市场相距较远，一般的制造业产品由于交通成本而在国内市场竞争力较弱，另一方面其位于边境且多位于“一带一路”沿线，有利于发展对外贸易。

3. 要素禀赋结构

人口要素对边疆民族地区制造业发展至关重要，同时亦能影响其“农本”的民族社会关系^[23]。本文对边疆民族地区劳动生产率、人口密度、少数民族人口占比以及受教育水平进行整理与比较。其中，劳动生产率通过工业增加值与从业人数之比测算得出，人口密度则由地区常住人口数量与土地面积相除计算得来^①。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所占比重偏高，人口密度和第一、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人力资本水平有待提升。具体而言，除辽宁和广西外，其他边疆民族地区人口密度均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内蒙古、新疆和西藏呈现出明显的“地广人稀”特征，人口密度分别为 20.33 人/平方千米、20.29 人/平方千米和 2.97 人/平方千米。从民族构成来看，新疆、西藏两地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超过 50%，其中西藏少数民族人口总数为 320.47 万人，在地区常住人口中所占比重高达 87.85%；内蒙古和广西作为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区，少数民族人口占比同样突破 20%，并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而云南由于地理位置以及历史原因，少数民族人口总数共计 1 563.60 万人，在国内仅次于广西，同时也是国内特有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②。在分布上，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同时呈现聚居和杂居的特点，集中管理难度极大，不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规模集聚；另外，由于地形地貌复杂多变、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较高、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等原因，部分边疆民族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整体偏弱，西藏、云南、广西每 10 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的人口数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不利于推动产业机械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的提升。

4. 制度禀赋结构

(1) 正式制度。50%以上的边疆民族地区属于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区，地域性、民族性特征更为突出，其发展与国境稳定密切相关。为确保边疆民族地区融入国家建设与发展整体框架^[24]，20 世纪末以来针对上述区域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经济、文化、教育、民生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陆续出台，并带来治理方式与体制机制的革新。边疆民族地区正式制度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政策法规的特殊性。由于周边形势复杂、教育普及度偏低、语言文化不通等原因，边疆民族地区往往缺乏良好的营商环境，因而需要依靠国家特殊政策推动当地软硬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企业市场交易成本，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劳动力就业和对

^① 结果留存备案。

^② 数据来源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外开放。例如支持边民自主创业的“零成本”政策^①、针对边疆民族地区矿产资源开发的补偿分成优惠政策^[22]等。在针对边疆民族地区的一系列举措中，最具典型性和特殊性的便是“兴边富民”行动以及对口支援政策。“兴边富民”行动最早于1999年发起，针对全国140个陆地边境县（市、区、旗）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58个边境团场，旨在通过国家各部委合作，共同提升民生保障水平和开放程度，推动当地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从而维护边疆稳固。而中国对口支援最早也是从边疆民族地区开始，虽然当前援助对象已经逐步拓展至中国其他落后地区，但针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对口支援政策时间跨度最长，影响也最为深远。二是工作机制的特殊性。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边疆民族地区战略意义尤为突出，其高质量发展不仅事关民族团结，同时也会对边境安全产生影响。因此针对新疆、西藏地区，国家从战略全局出发，由中央统一配置资源，在现行政治/行政体系之外形成“地方一全局”双重性质叠合的工作机制^[25]，即工作座谈会，因地制宜解决其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紧迫问题，实现了边疆民族地区工作思路和方法的重大创新。

（2）非正式制度。边疆民族地区具有明显的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特征。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与国内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相比，边疆民族地区世居民族多为跨境民族。跨境民族兼具文化意义上的民族属性和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属性^[26]，其分布范围广、聚集程度高、宗教信仰多元，与其他国家语言、文化、宗教的相似性和兼容度更高，交流往来也更为紧密。例如，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各国跨境民族的分布呈现出四个特点：一是分布集中，16个跨境民族聚居于三千多公里的国境线上；二是跨越多个国家，如苗、瑶、傣等分布于4个以上国家；三是同一民族虽居住在不同的国家，但分布地域大体相连；四是在同一地域内，不同民族交错混居。^{[27]1-6}。以上特征对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具有两面性。一方面，鲜明的民族特色有助于发掘更符合当地比较优势的产品，边疆民族地区可以凭借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共通性，将产品出口至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从而促进跨境贸易发展，提升边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必须警惕外部势力利用人权、民族、宗教等问题对边疆民族地区实施“西化”“分化”的问题。

（二）边疆民族地区产业升级问题的分析重点

1. 结合边疆民族地区特殊属性与发达地区产业转进趋势

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地理位置险要、跨境民族聚居，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宗教、文化、语言更为多元，所面临的外部发展环境也更为复杂艰巨，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具有突出的战略地位。鉴于以上特征，除了推动经济发展之外，边疆民族地区的另一大主要任务便是维持边境和平与稳定。目前绝大多数边疆民族地区工业基础薄弱，人力资本水平偏低，并且存在严重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最终可能增加公共安全事件以及外部势力渗透的风险。在此背景下，产业若具有较强的劳动创造能力，且与当地工业基础相契合，不仅能够推动边疆少数民族剩余劳动力就业，还有助于提升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加快实现共同富裕，从而实现“维稳促发”的目标。

另外，由于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不断上升，在西部大开发、对口支援、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等政策战略的推动下，中国发达地区开始将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部分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环节迁移至边疆民族地区。因此，在对产业进行分析时，不仅需要考虑该产业在当地是

^① 数据来源于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

否具备发展基础，同时也需要对其在发达地区的发展前景进行综合研判。事实上，对于东部发达地区而言，利用当地科创资源、人才储备、信息技术等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已然成为大势所趋。以纺织服装产业为例，江苏、浙江近年陆续出台《关于进一步推动全省纺织服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关于支持纺织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举措》等多项政策，明确提出要深化数智赋能，推动纺织服装领域数字化平台建设。而部分学者通过研究，同样验证了纺织服装与电子信息产业的融合对于产业创新能力以及出口规模提升的重要作用^[28]。因此，东部发达地区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未完全丧失比较优势，并且在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下，正朝着“微笑曲线”两端高附加值环节升级。在评估边疆民族地区产业发展现状及前景时，同样需要将上述因素考虑在内，从而明确产业承接的具体环节。

2. 应基于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阶段与差异化特征

产业发展现状与前景评估固然需要聚焦边疆民族地区的共性，但更应将中国不同边疆民族地区的差异化特征考虑在内。首先，各边疆民族地区拥有不同的自然禀赋，在不同产业上具有原材料优势。其次，在非正式制度上，各边疆民族地区由于地理位置、接壤国家、民族结构不同，其民俗文化、宗教信仰天差地别，少数民族彼此之间、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族际涵化程度也存在差异^[25]。因此，在对某一类产业进行深度分析时，需要重点考量两个方面。一是边疆民族地区发展该产业是否具备原材料优势，从而更好地判断当地该产业的潜在比较优势，也有利于判断其更适合着重发展哪些生产环节。二是地区的民族分布特点与文化认同程度。当前，仍有大量边疆民族居民以传统农林牧渔产业为生，其受教育年限相对较短，甚至存在语言交流不畅等问题。为充分吸纳农村剩余少数民族劳动力就业，需要进一步明确地区民族分布情况、民族心理、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融合程度、当地少数民族居民对汉族文化的认同程度等方面的内容。

3. 应考虑边疆民族地区面临的地缘政治形势与制度禀赋优势

现阶段，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已经由国家治理边缘转向对外开放前沿，更成为国家与国家之间博弈的重要阵地。边疆民族地区在地缘政治意义上极为重要，因此在识别当地产业升级可能面临的瓶颈制约因素时，应当将上述重要背景考虑在内，一方面是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针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制裁与技术封锁，另一方面是周边邻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形势以及对边政策。边疆民族地区接壤国家大多处于发展中阶段，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交流频繁、跨境通婚普遍。但是，目前部分周边国家仍然存在不安全因素，对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人民安居、跨境贸易等产生了负面效应。以云南为例，其西南部地区与缅甸接壤，近年缅北政治形势不稳定使其邻近城市的发展受到阻滞。另外，也需要充分考虑邻近国家对边政策可能造成的影响。比如越南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边境定居策略，包含针对边境地区采取的农村医疗免费、教育补助、边境口岸财政返还等政策^[29]，有可能导致边疆民族地区劳动力部分流出，甚至影响当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

针对边疆民族地区发展问题，国家除了提供特殊的政策支持（例如对口援建以及其他针对性优惠举措），还形成了一套有别于国内其他地区的工作方法。而在边疆民族区域内部，同样存在极为特殊的行政区划或者管理体制（例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因此，面临地缘政治形势带来的挑战以及其他瓶颈约束，中央以及边疆民族地区政府应当利用当地所具有的制度禀赋优势，发挥因势利导作用。事实上，制度禀赋在边疆民族地区产业发展过程中始终发

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以新疆纺织业为例，2010 年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后，其快速发展，“十二五”期间，全国纺织 500 强和国内外知名企业有 40 余家在新疆投资建厂，新建和重组棉纺产能占全区总产能的 85%左右。通过总结产业过去的发展、转移的经验和教训，能够为“有为政府”发挥因势利导作用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避免“乱为”和“不作为”的情形。

四、研究结论与展望

边疆民族地区在地缘政治、经济发展、文化建设和生态环境方面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全局的重要性。而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符合边疆民族地区比较优势，且就业创造效应强大、维稳能力突出，对于边疆民族地区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文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出发，对新疆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与升级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发现，新疆作为中国最大的棉花生产基地，具有适合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的自然禀赋条件、要素禀赋条件和制度禀赋条件。但是，在其转型升级过程中，却面临来自市场需求、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自然环境方面的约束。对此，新疆应当基于自身的发展阶段、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对口援疆这一制度优势，把握“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发展契机，通过加强劳动技能培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兵地协同合作等方式，更好地开拓国内外市场，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推动产业链各环节技术创新，从而有效应对西方国家制裁带来的外部风险。

新疆纺织服装产业升级中存在的问题及应对之策对推动其他边疆地区、其他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西藏、云南、广西、内蒙古等边疆民族地区与新疆发展阶段相近，区域属性相似，其经济发展总体滞后，工业基础较为薄弱，且存在严重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自然禀赋方面，边疆民族地区多有能源、上游原材料优势，可以依托当地自然禀赋资源驱动制造业发展；要素禀赋方面，边疆民族地区人口密度较低，少数民族人口所占比重偏高，人力资本水平有待提升；制度禀赋方面，边疆民族地区长期接受来自发达地区的对口援助，具有明显的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特征，不论在政策法规还是工作机制均存在特殊性，目前已经成为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重要区域。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深入实施，如今边疆民族地区正走向对外开放的前沿，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结合以上特征，在对中国边疆民族地区产业进行分析时，应基于不同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阶段、特殊属性和差异化特征，同时将发达地区部分产业的转进趋势以及边疆民族地区面临的地缘政治形势考虑在内。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利用边疆民族地区的制度禀赋优势，充分发挥因势利导作用，因地制宜推动产业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李俊清. 边疆民族地区公共安全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J]. 中国行政管理, 2014,30(11): 52-55.
LI J Q. Study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public security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bility in the frontier minority areas[J].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4, 30(11): 52-55.
- [2]张明波. 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挑战与治理路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边疆和民族地区治理的重要论述[J]. 社会主义研究, 2022, 45(2): 84-91.

- ZHANG M B.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of frontier minority areas in the new era: challenges and governance path: learning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statements on governance of frontier minority areas[J]. *Socialism Studies*, 2022, 45(2): 84-91.
- [3] 陈全功, 程蹊. 空间贫困理论视野下的民族地区扶贫问题[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31(1): 58-63.
- CHEN Q G, CHENG X. Poverty alleviation issues in ethnic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poverty theory[J]. *Journal of 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1, 31(1): 58-63.
- [4] 刘东, 荆蕙兰, 王家斌. 后脱贫时代边疆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 逻辑理路、价值转向及战略选择[J]. *广西民族研究*, 2021, 37(5): 172-180.
- LIU D, JING H L, WANG J B. Governance of relative poverty in border minority areas in post-poverty era: logical path, value turning and strategic choice[J]. *Guangxi Ethnic Studies*, 2021, 37(5): 172-180.
- [5] 高志刚, 刘伟.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差异与协调发展: 以新疆为例[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62(3): 147-160.
- GAO Z G, LIU W. Regional economic differences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northwest minority areas: taking Xinjiang as an example[J]. *Nankai Journal (Philosophy Literature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6, 62(3): 147-160.
- [6] 刘金山, 徐明. 对口支援政策有效吗: 来自19省市对口援疆自然实验的证据[J]. *世界经济文汇*, 2017, 61(4): 43-61.
- LIU J S, XU M. Is the paired assistance policy effective: evidence from the natural experiment of paired assistance to Xinjiang by 19 provinces and cities[J]. *World Economic Papers*, 2017, 61(4): 43-61.
- [7] 徐明. 中国省际合作帮扶政策的经济效应: 对21世纪“19省市对口援疆大型区域扶贫项目”的评估[J]. *经济学(季刊)*, 2023, 23(3): 1202-1225.
- XU M. Economic effects of China's inter-provincial cooperation and assistance policy: evaluation of the “19 provinces and cities counterpart aid Xinjiang large-scale reg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 in the 21st century[J].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2023, 23(3): 1202-1225.
- [8] 王禹瀚. 中国特色对口支援机制: 成就、经验与价值[J]. *管理世界*, 2022, 38(6): 71-85.
- WANG Y H. The paired aiding mechan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chievements, experience and value[J]. *Management World*, 2022, 38(6): 71-85.
- [9] 曲玥, 蔡昉, 张晓波. “飞雁模式”发生了吗: 对1998—2008年中国制造业的分析[J]. *经济学(季刊)*, 2013, 12(3): 757-776.
- QU Y, CAI F, ZHANG X B. Has the “Flying Geese” occurred in China? An analysis on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from 1998 to 2008[J].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2013, 12(3): 757-776.
- [10] 杨富强. “对口援疆”政策回顾及反思: 以1997年至2010年间政策实践为例[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33(5): 109-115.
- YANG F Q. Review and reflection on the paired assistance to Xinjiang policy: taking the policy practice from 1997 to 2010 as an example[J]. *Journal of Northwest Minz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2011, 33(5): 109-115.
- [11] 黄先海. 纺织产业内升级的特征及启示[J]. *中国工业经济*, 1998, 16(7): 30-33.

HUANG X H. Characteristics and implications of upgrading within the textile industry[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1998,16(7):30-33.

[12]顾强. 纺织区域结构调整中的新情况及其对策[J]. 中国工业经济, 1997,15(9): 44-48.

GU Q. New development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regional structural adjustment of the textile industry[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1997,15(9):44-48.

[13]王珺, 岳芳敏. 技术服务组织与集群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形成: 以南海西樵纺织产业集群为例[J]. 管理世界, 2009,25(6): 72-81.

WANG J, YUE F M. Format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in cluster enterprises and technical service organizations: taking the Nanhai Xiqiao textile industry cluster as an example[J]. Management World,2009,25(6):72-81.

[14]熊兴, 王婧倩, 陈文晖. 新形势下我国纺织服装产业转型升级研究[J]. 理论探索, 2020,37(6): 97-101.

XIONG X, WANG J Q, CHEN W H. Research 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textile and apparel industry under the new situation[J]. Theoretical Exploration,2020,37(6):97-101.

[15]刘众. 工业互联网赋能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市场化逻辑与实现路径: 以纺织服装产业为例[J]. 科技管理研究,2023,43(8):144-150.

LIU Z. Marketization logic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industrial internet empower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taking the textile and garment industry as example[J].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2023,43(8):144-150.

[16]王勇. “十四五”时期中国产业升级的新机遇与新挑战: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J]. 国际经济评论, 2021,29(1): 56-75.

WANG Y.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China's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2021,29(1):56-75.

[17]王勇, 华秀萍. 详论新结构经济学中“有为政府”的内涵: 兼对田国强教授批评的回复[J]. 经济评论, 2017,38(3): 17-30.

WANG Y, HUA X P. A detailed discussion on the connotation of “Facilitating State” in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reply to professor Tian Guoqiang's criticism[J]. Economic Review,2017,38(3):17-30.

[18]朱兰, 王勇, 李泉剑. 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 以宁波如何融入长三角一体化为例[J]. 经济科学, 2020,42(5): 5-18.

ZHU L, WANG Y, LI X J. A study on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 case of Ningbo integrating into the Yangtze River Delta[J]. Economic Science,2020,42(5):5-18.

[19]于佳, 王勇. 中国光伏产业发展与“一带一路”新机遇: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解析[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0(5): 87-98.

YU J, WANG Y. Development of the photovoltaic industry in China and new opportunities from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J]. Journ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2020,40(5):87-98.

[20]王勇, 徐婉, 赵秋运, 等. 中国新能源汽车何以实现换道超车: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23, 43(9): 39-54.

- WANG Y, XU W, ZHAO Q Y, et al. How China's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y achieved successful development: an analysis based on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J]. *Economic Theory and Business Management*,2023,43(9):39-54.
- [21]范海龙, 李玉敏. 当前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问题的诱因分析及应对措施[J]. *宁夏社会科学*, 2014,33(6): 74-80.
- FAN H L, LI Y M.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social stability issues in China's border ethnic areas and countermeasures[J]. *Social Sciences in Ningxia*,2014,33(6):74-80.
- [22]青觉, 王敏. 边疆民族地区融入国家新发展格局的生成逻辑、面临挑战与路径取向[J]. *西北民族研究*, 2022,37(5): 142-159.
- QING J, WANG M. Generation logic, challenges, and path orientation of border ethnic areas integrating into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J]. *Journal of Northwestern Ethnic Studies*,2022,37(5):142-159.
- [23]朱要龙, 刘培培. 边疆民族地区流动人口的人口社会学特征分析: 以云南为例[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4(6): 66-74.
- ZHU Y L, LIU P P. A study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ethnic minority borderland i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demography: a case study in Yunnan province of China[J]. *Journal of Yunnan Minz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2017,34(6):66-74.
- [24]徐俊六. 边疆民族地区构建民族互嵌型社区的现实基础与路径选择[J]. *广西民族研究*, 2017,33(5): 16-24.
- XU J L. The realistic basis and path choice of constructing the ethnic mutual embedded community in the frontier minority areas[J]. *Guangxi Ethnic Studies*,2017,33(5):16-24.
- [25]王茂侠. 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和稳定的特殊工作机制: 以五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为中心[J]. *民族研究*, 2012,28(6): 25-32.
- WANG M X. A research on the special work mechanism of the development and stability of the frontier minority areas in China: based on the five Tibetan work conferences held by the central authorities[J]. *Ethno-National Studies*,2012,28(6):25-32.
- [26]崔榕. 边疆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与对策[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 37(3): 15-19.
- CUI R.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ideological security in border ethnic areas[J]. *Journal of 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2017,37(3):15-19.
- [27]申旭, 刘稚. 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跨境民族[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8.
- SHEN X, LIU Z. *Border Minorities of Southwest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M]. Kunming: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of Yunnan, 1988: 1-6.
- [28]李晓钟, 黄蓉. 工业4.0背景下我国纺织产业竞争力提升研究: 基于纺织产业与电子信息产业融合视角[J]. *中国软科学*, 2018,33(2): 21-31.
- LI X Z, HUANG R. Research on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textile industry in the context of industry 4.0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textile industry and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y[J]. *China Soft Science*,2018,33(2):21-31.
- [29]何为. 增进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政治认同的三维路径[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39(3): 86-94.
- HE W. An analysis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paths to enhance political identity in Yunnan's frontier minority areas[J]. *Journal of Hubei Minz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2020,39(3):86-94.